

我在底層的生活

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

Nickel _____ and _____ Dime

On (Not) Getting By in America

Barbara Ehrenreich

芭芭拉·艾倫瑞克——著 林家瑄——譯



NICKEL AND DIMED: On (Not) Getting by in America by Barbara Ehrenreich

Copyright: © 2001 by Barbara Ehrenreich

Chinese (Complex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0 by

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wan

ALL RIGHTS RESERVED

左岸 | 社會觀察 145

我在底層的生活：當專欄作家化身為清潔婦

作 者 芭芭拉·艾倫瑞克 (Barbara Ehrenreich)

譯 著 林家瑄

總 編 輯 黃秀如

責 任 編 輯 許越智

封 面 設 計 鄭宇斌

電 腦 排 版 哀遠彩藝

社 長 郭重興

發 行 人 暱 曾大福

出 版 左岸文化

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

電 話 02-2218-1417

傳 真 02-8667-1065

客 服 專 線 0800-221-029

E - M a i l service@sinobooks.com.tw

左岸文化網站 <http://blog.roodo.com/rivegauche>

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

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 版 2010年10月

七 刷 2011年03月

定 價 300元

I S B N 978-986-6723-45-2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(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)

我在底層的生活

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

NICKEL AND DIMED

On (Not) Getting By in America

芭芭拉·艾倫瑞克（Barbara Ehrenreich）著

林家瑄 譯

目次

序 章	準備開工	—	—	0 0 5
第一 章	在佛羅里達州當服務員	—	—	0 1 7
第二 章	在緬因州擦擦抹抹	—	—	0 6 7
第三 章	在明尼蘇達州賣東西	—	—	1 5 3
第四 章	成果評估	—	—	2 4 5

序章 準備開工

這本書最初發想的地點，是在一個頗為奢華的場景。一天，《哈潑》雜誌的編輯路易斯·拉方（Lewis Lapham）帶我到一家法式鄉村風餐廳，討論我未來可以替他們寫些什麼文章。那裡光一頓午餐就要價二十美金，印象中我吃了鮭魚和田園沙拉。當我們的對話轉到貧窮問題上時，我對這個比較熟悉的議題發表了一些意見，認為我們可以做一些跟大眾文化有關的題材。譬如說，那些缺乏專業能力的人，到底是怎麼靠微薄的薪水來生活？尤其是幾近四百萬名的女性，她們因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進入勞動市場，又該如何靠著一小時六或七美金的新資生存下去？接著，我就說了一句後來有很多機會感到後悔的話：「實在應該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聞調查工作，你知道，就是自己實際到那些地方親身體驗看看。」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輕的人，某些求知若渴、有時間做這

些工作的新進記者。但這時拉方臉上露出有點瘋狂、要笑不笑的表情，我知道這是他在決心時的樣子。過了長長的幾秒後，他吐出三個字：「妳來做。」

上一次有人勸誘我捨棄正常生活去從事工時長而低薪的勞動工作，已經是七〇年代的事了。當時有數十名（也許數百名）六〇年代的激進分子開始進入工廠，想讓自己「無產階級化」，並在過程中組織起工人階級。但那可不是我。我同情那些父母，他們付錢讓這些想成為藍領階級的孩子上大學，也同情這些基進分子試圖加以「提升」的對象。在我自己的家庭裡，低薪生活離我從來就不遙遠。在許多時候，它其實讓我很珍惜自己現在的寫作生活，即便收入不高。我姊姊做過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，包括電話公司客服人員、工廠工人和接待員。她必須一面工作，一面不斷跟她所謂的「薪水奴隸的絕望感」對抗。我和後來結婚十七年的先生墮入情網時，他還是一名時薪四點五美金的倉庫工人。當他最後終於逃離那裡，成為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之一時，他才大大鬆了一口氣。我父親是一名銅礦工人，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礦場就是在聯合太平洋公司工作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，更是一項責任，我想替在我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們發聲，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。他們有許多話想說，但願意聽的人卻少之又少。

除了我自己的疑慮不安之外，有些家族成員還於事無補地不斷以各種方式提醒我，其實我可以在不影響自己研究工作的情況下進行這項計畫。例如我可以改用新進人員的標準來發給自己薪水，收自己房租錢和一些生活費用如瓦斯等，然後在一個月後把這些數字加總起來就得了。若以我們鎮上一般平均六至七美金時薪的薪水，租一間月租大約四百美金的房子住，最後加總出來的薪水和支出也許可以勉強平衡。但若我們談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單親媽媽，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協助，如食物券、醫療補助、住屋和兒童照護津貼等的情況下生存，那麼答案不用我出門到外頭去體會就已經知道了。全美遊民聯盟（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）在一九九八年（也就是這項計畫進行的那年）指出，取全美境內的平均數來計算，一個人需要賺到八點八九美金的時薪，才能租得起一間附一個臥房的公寓。另外，公共政策前行中心（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）則估計，在符合福利政策補助資格的人之中，每九十七人只有一人能取得這種工作，賺得「讓人活得下去的新資」。我幹嘛還費事去證實這些令人難過的事實呢？等到我再也無法逃避這項逐漸逼近的工作時，我開始感覺自己有點像以前認識的一名老人，他會用計算機算好帳本上的收支結果，然後再回頭用筆把每一筆帳目的數字算一遍，只為了確認先前的結果沒錯。

到頭來，克服我内心猶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名科學家，而事實上，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。我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，而且並不是靠著坐在書桌前搬弄一些數字得來的。在這個領域裡，你是可以天馬行空地思考，但到最後，你還是必須實地下去做，投身到每天發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。在自然界裡，連最平凡的小地方都會冒出驚喜。也許，等我真正著手進行這項計畫，就會在低薪勞工的世界裡發現某些隱藏的經濟原則。畢竟，如果像以華盛頓為總部的經濟政策研究所（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）在一九九八年所指出的一樣，有百分之三十的勞動人口都靠著八美元或更少的時薪掙扎度日，那麼他們大概找到某些我還不曉得的祕訣，使他們能夠存活下來。或許，我甚至還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傢伙們信誓旦旦講的一樣，在自己身上發掘到所謂「走出家庭所帶來的振奮心理效應」。又或者在另一方面，會有出乎意料的代價等著我去付（身體上、財務上和情感上的），推翻這一切事先的算計。無論如何，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，就是不要怕弄髒手，走出去實際做。

秉持著科學精神，我首先決定出一些原則和參數。很顯然地，第一項原則就是在找工作的時候，任何單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時工作經驗就會的工作都不能選（但這麼說的意思可不是徵求專欄作家的廣告就有一大堆）。第二項原則是，我必須在所有能做的工作

中找到薪水最高的，並確實保住它。意思就是，我不能擺出馬克思主義者的架勢大罵雇主一番，或溜班躲在女生廁所裡讀書。第三項原則是，我必須在安全性和隱私性尚可的前提下，盡能找到最低等級的住宿環境。雖然我對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，而且後來也證明，我的標準隨著時間過去也越降越低。

我努力堅持這些原則，但隨著計畫實際進行，我會在某些時刻稍微做調整，甚至把它們丟在一邊。例如在一九九八年春末，當我剛開始在佛羅里達州的西嶼（Key West）進行這項計畫時，我曾跟面試者說，我可以用正確的法文或德文跟歐洲客人講「您好」，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員的工作，但這是我唯一一次洩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。二〇〇〇年初夏，在這項計畫的最後一站明尼亞波里斯，我又違背另一條原則，因為我沒去做當時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。我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否有理，留待各位讀者來判斷。而計畫進行到最後，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氣，放膽痛斥雇主一頓（雖然是私下地，也從來沒被管理階層聽到）。

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我怎麼向未來的雇主推銷自己，特別是該怎麼解釋我為何這麼缺乏相關工作經驗。誠實是最好的策略，講實話但保留一些細節不談，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。於是我在面試者說自己是一名離婚婦女，在當了許多年家庭主婦之後

決定重回職場。這些話確實並非謊言。有時候（雖然不是每次）我會摻進一點清潔婦的工作經驗。我住在西嶼的時候，經常會在晚餐後幫我室友做一點清理工作，所以我就請室友幫我寫介紹信，做為面試時的履歷文件。此外，一般應徵表格也會要求填寫教育程度，在這點上，我想博士學位不會有任何加分的效果，甚至反而可能讓雇主懷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問題才淪落至此。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為只念了三年大學，但列出我真正讀過的母校名稱。結果，沒人對我的背景有疑問，而在幾十個雇主中，只有一個費事去確認我的介紹信。有一次，一個特別愛聊天的面試者問到我的嗜好，我回答：「寫作。」而她似乎完全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，即便她面試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識丁也能做得非常好。

最後，為求安心，我設下一些底線，以免我遇到的考驗超乎我的承受能力。第一，我一定要有車子。在西嶼我是開自己的車，在其他城市則利用租車服務，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這筆費用。沒錯，我是可以多走些路，或把可能的工作機會限制在大眾交通工具能抵達的地點。但我只是覺得，一個老是在寫等巴士的故事，對讀者來說大概沒什麼吸引力。第二，我摒除流浪街頭這項選擇，因為這個計畫的主要用意在於：看我能否在幾個城市找到工作，並在當下賺得足以支付下個月房租的薪水。若我付完某一週

的房租之後就完全沒錢了，我會當場把這個計畫喊停，不會去住遊民庇護所或睡在車上。此外，我也無意讓自己餓肚子。我在這項「實驗」開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證，若事情真的發展到我錢包空空，連吃下一餐飯都成問題，我會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後偷偷大吃一頓。

所以，這本書並不是關於什麼出生入死的「臥底」冒險經驗。我做的事幾乎任何人做得來：找到工作，把這些工作做好，努力量入為出，使收支平衡。事實上，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只是他們既沒有號角吹奏陪伴出征，也沒有像我一樣怕得發抖。

當然，我和從事這些全美最不吸引人工作的人非常不同。這些不同之處一方面對我有幫助，一方面也限制了我。最明顯的不同就是，我只是去造訪一下這個世界，但這些人往往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得待在裡面。此外，我還有至今所累積的實際資產當靠山，比如銀行存款、退休儲蓄、健康保險和一個有好幾個房間的家，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什麼「親身體驗貧窮」，或瞭解身為一個長期低收入勞工的「感覺」到底是什麼。我做這件事的目標是更直接而客觀的：看看我可不可以把收入和支出打平，就像真正的窮人每

天都必須做的事情一樣。此外，我一生中已經跟貧窮不期而遇過太多次，足以知道那不是一種你會想體驗的生活，那裡充滿太多恐懼的滋味了。

我比許多低收入勞工更有利的一點是：我是白人，而且會說道地英語。我不認為這會影響到我被錄用的機率，因為勞工市場在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〇年間極度緊縮，業者幾乎是有人就用，但這點幾乎確定影響到我被雇去做「什麼樣」的工作。在西嶼的時候，我原本以為飯店房間清潔人員會是我比較容易找到的工作，所以最初是朝這個方向找，但後來我卻不斷發現自己被雇去當服務生，原因無疑就在於我的種族和英語能力。正如後來事情的發展一樣，當服務生的收入並沒有比當飯店房間清潔人員多，至少我在西嶼工作的淡季期間小費其實很少。但這次經驗確實對我選擇其他的居住與工作地點有幫助。舉例來說，我會排除掉一些地方如紐約和洛杉磯，因為那裡的勞工階級主要是由有色人種構成，若一個滿口道地英語的白人女子在那裡找低階入門工作，很可能只會顯得飢不擇食或啓人疑竇。

我還有其他優勢（例如車子），使我跟當時許多同事截然不同。理想上，若我想完全重現一名被迫脫離福利制度的女性如何重新進入職場，我必定還會拖著幾個小孩要養，但我自己的小孩都早已長大，而且他們沒有一個願意把自己的孩子借我來度一個月

的貧窮假。除了有移動能力和沒有家累之外，跟大部分長期處於低收入狀態的勞工們相比，我的健康狀況也很可能比她們好。我擁有的優勢實在太多了。

除了以上這些之外，若我和其他勞工們在更隱敝的面向上還有什麼不一樣，目前為止倒還沒人告訴我過。當然，我完全沒有刻意扮演某種角色，或去符合一般人想像中低收入女性勞工的樣子。在任何能穿便服的場合裡，我都穿著平常自己就會穿的衣服，保持我平常的髮型和化妝。跟同事聊天的時候，我會談到自己真正的孩子、婚姻狀況以及人際關係，我沒有理由去捏造一個全然虛構的生活。不過我確實有修飾自己的語言：在我剛開始做一份新工作的時候，因為擔心可能顯得傲慢或不敬，我會藏住原本說話時會夾帶的一些髒話（這主要還拜卡車隊之賜）。除了這點之外，我會開玩笑，講些挖苦話，提供我的看法跟意見，以及多得出乎意料的健康建議，就跟我在其他任何場合會做的事情一樣。

進行完這項計畫之後，好幾次有人問我：跟你一起工作的人難道都沒發覺真相？因為問的人大都假設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平常講話就一定不太一樣，而且談話內容層次比較高。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，真的曾經有一些雇主或同事覺得我很特別，例如我比較有智慧或比大多數人受過更多教育，但這種情況從來沒發生過。我猜那是因為，唯一真

正使我顯得「特別」的地方，就是我竟然如此缺乏工作經驗。換個方式來說，跟我們這些寫作維生的人比起來，低收入勞工們也有多樣的人格特質或能力，也能展現出風趣和聰穎。若有任何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認為如此，那麼此人還真該去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。

當然，自始至終一直有個只有我知道的差別存在：我不是為錢工作，而是為了一篇文章和後來變成的書。我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去面對普通的居家生活，而是面對一台筆記型電腦，花一、兩個小時記錄當天發生的事。而且我得說，我是非常勤奮地做這件事，因為顯然不可能在白天工作時還記筆記。這台讓我可以連結到自己過去和未來的筆記型電腦，象徵著這其中的欺瞞。這種欺瞞相當程度地困擾著我，至少是在面對我關心、想進一步認識的人時讓我很不好受（在這裡我想提一下，本書中所有名字和個人細節都經過更改，包括所有同事和出現在計畫中的其他人士，以便保護他們的隱私。我也更改了大多數的工作場所名稱及其確切地點，以便更確實保證我所遇到的人們身分不會曝光）。

在每個地方的工作快要結束時，我都會煎熬不已地向幾名選擇好的同事揭露「真實身分」。結果她們的反應總是驚人地很不戲劇化，我最喜歡的是：「妳的意思是，下禮

拜你不會來上晚班了？」我想了很久，為什麼她們沒有更多驚訝的情緒或甚至被騙的憤慨，部分答案也許就在一般人對寫作的看法。幾年前，當我嫁給第二任丈夫時，他驕傲地跟擔任旅館停車員的叔叔說我是個作家。那位叔叔回答：「誰不是啊？」每個有讀寫能力的人都能「寫作」，在我透過這項計畫結識或遇到的低收入勞工之中，有一些會寫日記短文和詩，甚至還有一個在寫長篇科幻小說。

不過，計畫進行到後期我才發現，也可能是我太把自己的「欺瞞」無限上綱了。舉例來說，當服務生這件事情根本無法作假，你要不把食物送到餐桌上，要不就是沒有。別人認識到的就是個服務生、清潔人員、老人之家的助手或售貨員，這不是因為我假裝成那樣的人，而是因為我就是那樣的人，至少在我跟他們相處的時候是如此。在做每份工作、居住在每個地方的時候，工作都耗掉我所有精力和大部分思考能力。這點我並沒有誇大。即便我從一開始就有預感，要把薪水和房租打平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，我還是非常努力試圖做到。

我並不想宣稱自己的經驗可以代表任何人，因為我的情況根本一點也不具代表性。我只想請各位讀者記得，每當我在這條路上蹣跚蹣跚的時候，正是反映著以下這項事實：在社會如此富足豐裕的時刻，即使有著種族、教育、健康及動機所帶來的一切優